



“认知转向”：文学研究的新机遇

冯 军

(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重庆 400031)

摘 要:近年来,认知文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内外部分学者的焦虑。一些国外学者声称认知文学研究忽视了“传统”,是一种“折中主义”,有沦为“还原主义”和“极简主义”的危险;部分国内学者也对文学的“认知转向”持怀疑态度。究其原因,一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两种文化的长期存在割裂了两个学者群体之间的联系,一些学者因不了解认知科学和认知文学研究而对此领域持有偏见;二是认知文学研究在发展初期存在一些阶段性的瑕疵,导致部分学者对认知文学研究产生怀疑。分析表明,学者们对认知文学研究的批判其实是对新生事物的一种过度焦虑。认知文学研究借鉴认知科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目的是解决文学问题,以“认知”为切入点深化传统的文学研究。因而文学的“认知转向”不仅不会使文学丧失“文学性”,反而为文学研究走出“后理论”困境提供了新的机遇。

关键词:认知诗学;认知文学研究;认知转向;文学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认知视角下的简·奥斯丁作品研究”(14BWW041)。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章编号] 1673-0186(2019)04-0118-010

[文献标识码] A

[DOI 编码] 10.19631/j.cnki.css.2019.04.011

认知文学研究(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术语,涵盖了所有运用认知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学的领域和范式,包括但不限于认知诗学、认知叙事学、认知文化研究、认知文体学、认知美学、神经美学等。这些领域、范式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因而各有侧重,但共同之处在于都借鉴了认知科学的方法或研究成果,并且关注文学的某个或多个方面。所以,从“大文学”的角度来考虑,这些研究领域都可称为认知文学研究。“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认知转向’开始影响到文学研究领域。”^[1]由于各流派、范式的学科背景不同,其发展也有早晚与快慢之分。比如,早在以上范式都尚未形成之时,许多研究并没有冠以“认知研究”的名号,但现在看来就是认知文学研究。在所有认知文学研究范式中,认知诗学是最早被系统化的,因而在国内知名度较高。

2015年,由丽莎·詹塞恩(Lisa Zunshine)教授主编的《牛津认知文学研究指南》(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的公开出版是认知文学研究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此后,各种认知文学研究的著作呈爆发式涌现。自2015年以来已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认知文学研究著作就不下20本。这些著作展现出了当前认知文学研究发展的两个趋势:一方面,继续深入探讨文学研究与认知科学结合的可能途径,这方面研究以概览性的理论方法介绍为主,具体的文本分析为辅,即“理论导向型”;另一方面,注重运用认知理论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解读,即“作家作品导向型”,经常涉及的作家包括莎士比亚、简·奥斯丁、塞万提斯、J·M·库切、乔伊斯、海明威等。前几年的认知文学研

作者简介:冯军(1989—),男,汉族,陕西汉中,四川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认知诗学、认知文学研究。

究大多属于“理论导向型”,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作家作品导向型”著作。这种转变,一方面是学术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理论发展成熟后,必然要回归作品,指导文学批评实践;另一方面这也是传统文学批评家质疑和认知文学研究者自省的结果,因为前期的认知文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对文学原理和功用的探讨,较少对具体文本作出分析。

一、国外学者对认知文学研究的批判

认知文学研究目前在国内外受到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的接受和认同。例如,2018年在威立·布莱克威尔(Wiley Blackwell)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理论手册》(A Companion to Literary Theory)一书中,第33章的标题为“认知文学批评(Cognitive Literary Criticism)”^[2],该章包含了“认知诗学”,而且编者将第33章的认知文学批评和其他传统文学批评范式如心理分析批评、文化批评、生态批评、创伤研究、酷儿理论、读者反应理论、文学进化理论等并列,这充分说明,认知文学研究已经在一定范围的文学研究者中得到了认可。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认知文学研究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引起了很多传统文学与文化研究者的焦虑,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拉斯·伯纳茨(Lars Bernaerts)等人概括了国外学者对认知文学研究的三种批判^[3]。第一种是“忽视传统(blindness to tradition)”。一些学者认为认知文学研究“没有考虑到传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与传统文学理论不够融洽。玛丽-劳拉·莱恩(Marie-Laure Ryan)在谈到叙事学的认知转向时指出,认知叙事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传统叙事学已经知道的,认知叙事学目前还不能拿出不那么显而易见的、令传统叙事学家吃惊的研究结果^[4]。对此我们认为,首先,认知文学研究与传统文学研究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继承和延续关系,而且两者的侧重点不一样。认知文学研究既然是一种“认知转向”,甚至有人称之为“认知革命”,对于文学研究的传统必然不可能全盘接受,认知研究范式与传统文学范式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是对传统范式的“认知升级”。例如,“认知生态批评”“认知酷儿理论”“认知后殖民研究”“认知空间批评”等认知范式都是对传统文学理论范式的“认知升级”。因此,不能说认知文学研究忽视了文学传统。其次,认知文学研究是基于认知科学的理论,具有实证基础,相比传统文学研究纯粹的理性思辨,认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具有更高的可信度,能够对传统文学研究得出的结论进行证实或证伪,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与传统研究结论相同或相悖的情况。

第二种是“折中主义(调和主义)(eclecticism)”。认知文学研究是人文与科学“两种文化”结合的产物,它从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中汲取理论养分,这既是它的一大优点,也是目前遭受攻击的薄弱之处——没有一套系统性的术语和理论模型,因而,一些批评者认为“认知文学研究”就像是“大杂烩”,是一种折中主义。莫妮卡·夫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在评价彼得·斯托克维尔(Peter Stockwell)和乔安娜·盖文斯(Joanna Gavins)等人的“认知诗学”时说:“他们的研究涉及太多的认知模型及其应用了。和他们这两本书一样,这种强烈的折中主义(a strong eclecticism)也反映在丽莎·詹塞恩(Lisa Zunshine)和斯坦福学派成员的认知研究中。”^[5]“然而,这些认知理论不仅五花八门,而且还可能互不兼容。”^[5]汉斯·艾德勒(Hans Adler)和萨冰·格罗斯(Sabine Gross)在《调整框架:对认知主义和文学的评价》(Adjusting the Frame:Comments on Cogni-



tivism and Literature)一文中也提到:“文学认知批评与以往的批评范式不同,那些范式都宣称了自己的‘定向学科(orienting disciplines)’,而文学认知批评并没有自己的‘导向学科’,只不过是朝着一连串模糊的‘导向领域(orienting disciplines)’在前进,这些领域构成了认知范式区别于其他文学范式的路标。”^{[6]199}但是他们认为:“尽管认知文学研究的理论来源具有模糊性(fuzziness),然而看起来生物学起到了“导向学科”的作用。”^{[6]199}我们认为,此处所谓的折中主义首先指的应该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文化调和主义。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本身就是一种二元论的人为化分,早就受到了学界的批判。认知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桥梁,目前语言学领域的主流学派认知语言学就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融合的典型代表。因此,认知文学研究也是时代的产物,不应该受到批评。其次,折中主义也可能指的是认知文学研究目前理论概念繁多、不成系统。然而理论概念丰富是认知文学研究具有强大解释力的源泉,也体现了其兼容并蓄的优点。认知文学研究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理论概念庞杂只是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待其发展成熟,自然会实现理论的系统化。

第三种是“还原主义(reductionism)或极简主义(essentialism)”。其代表人物是英国著名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雷蒙德·泰利斯(Raymond Tallis),他于2008年在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神经科学的幻觉”(The Neuroscience Delusion)的评论文章,该文的观点被许多批评认知文学研究的学者作为论据。雷蒙德·泰利斯(Raymond Tallis)认为:“通过谈论一些所谓的关于作者的‘大脑’和读者的‘大脑’的东西来替代传统文学理论及其社会建构主义和语言观念主义,即将一些抽象的思想不加批判地引用到文学作品,这一过程反而使文学丧失掉了其区别性特征、人为的意图和精心设计的优点。”^[7]雷蒙德·泰利斯(Raymond Tallis)认为,认知文学研究的还原主义倾向最终会模糊“文学性”^[7]。这种观点表达了国外大多数文学批评家对认知文学研究的焦虑。他们认为:“认知科学绝不可能揭示(解释)文学中各具特色的人物及其对独特的思维模式、情感和体验的感知能力,科学总是还原主义的。”^{[8]16}近年来,认知神经科学、进化理论的引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焦虑和担忧。他们担心进化论和神经科学的引入会将文学的“本质(essence)”简化到认知维度,或者对文学作品的认知解读将变成最终的解释(ultimate explanations)^{[3]15}。他们认为,文本解读可以用一系列认知和神经过程来描述这种信念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把这种认知神经机制当成全部(the be-all)和终极目标(end-all)^{[3]15}。艾伦·理查德森(Alan Richardson)也曾批判马克·特纳(Mark Turner)对连续性和普遍性的偏爱,认为马克·特纳(Mark Turner)的“文学心智”(the literary mind)没有考虑到文化的差异性和文学与文学阅读的独特性^{[9]4}。更令他们担心的是,认知文学研究具有实证优势,这可能会助长文学研究的“实证乐观主义(positivistic optimism)”。

雷蒙德·泰利斯(Raymond Tallis)等人的观点看似很有说服力,其实不然。首先,将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同于“生物主义”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初级认知确实带有浓重的生物主义成分,因为人也是一种生物,所以人的认知必然带有生物本能的印记,比如趋利避害的本能等,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认知科学研究的就是初级认知,人的认知更大程度上属于高级认知。认知文学研究者认为,文学作品中的虚拟人物认知就是真实人物的认知,因此认知文学研究不会将高级认知还原为低级认知。其次,他们认为认知文学研究无法解释文学的独特性本质。特伦斯·凯夫(Terence Cave)认为对这种观点基础的回应是“文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混合学科(a mixed discipline);它本身的语言和方法大多不具备很强的专业性,这使得它能够很好地与其他学科对话”^{[8]16}。特伦斯·凯夫(Terence Cave)的意思

是文学与认知科学对话能够更好地揭示文学的独特性(文学性)。文学的本质是认知的,故事情节的建构、人物心理的塑造、文本的语言组织都离不开认知。如果认同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文学性”概念,那么所谓的文学性就体现在作品的语言和结构上。传统的文学研究只能在表层对文学性进行阐释,而认知研究则可以对作品的文学性特征进行更深层次的解释,显然,认知文学研究并不会模糊文学性,反而深化了文学性研究。最后,对认知研究的实证主义方法的批判,我们认为,文学研究除了传统的逻辑推理和阐释,还可以采取多样化的方式,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比如认知科学的实验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即便如此,认知文学研究也不一定全部要用认知科学的研究方法,而更多的是借鉴认知研究的成果,认知的实验由认知科学家做,认知文学研究者只是利用他们实验得出的结论来深化文学研究。

二、国内学者对认知文学研究的质疑

与国外不同,国内明确质疑或反对认知文学研究的声音并不多,但部分学者对文学跨学科研究存有疑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部分学者对认知文学研究的态度。例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刊登了汪介之教授的一篇笔谈文章,标题为《“理论入侵”与外国文学研究创新之惑》。该文称“哲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神学、经济学、法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卫生学等,以及其下更为琐细的交往行为理论、身份理论、身体哲学、性心理学、空间理论、创伤理论、后殖民主义、世界主义、新经济批评理论、福柯的规训理论、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资本和场域理论”进入文学研究是一种“理论入侵”,“这些非文学理论对文学研究‘鹊巢鸠占’,把文学研究完全变成了表达自身的领地与平台,而后者反被异化为这些理论的注解和佐证”^[10]。不可否认,该文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学术批判性和现实意义,但是将非文学学科理论引入文学研究看作是“理论入侵”和“鹊巢鸠占”,未免有矫枉过正之嫌,甚至意图将很多早已被文学界所接受和广泛运用的理论如身份理论、空间理论、创伤理论、后殖民主义等也赶出文学研究的领地。若果真如此,试问文学研究还剩下什么。所以这种做法既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现实的。

蒋承勇教授也撰文指出:“‘场外征用’指的是将非文学的各种理论或原理调入文学阐释话语,用作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基本方式和方法,它改变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走向。场外征用这种方法无疑会把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引入误区。”^[11]但随后他又强调:“对文学进行文化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跨学科、多学科、多元多层次的研究,对文学研究与批评不仅是允许的和必要的,而且研究的创新也许就寓于其中了。”^[12]但是,这些观点似乎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处境,一方面反对将非文学的各种理论调入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又鼓励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试问如果不使用其他学科的理论 and 概念,又如何实现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呢?对于文学研究究竟应不应该借助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或概念,这应该是一个量的问题而非质的问题。所谓的量的问题,就是文学研究多大程度上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或成果;所谓的质的问题,就是文学研究能不能、应不应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或成果。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只认可非认知的文学跨学科研究,而不认可认知的文学跨学科研究。目前国内还有很多传统文学研究者属于此类。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反对文学跨学科研究,而是不了解、



惧怕“认知”，对“认知”存有偏见，认为“认知”是一个捉摸不透、抽象的科学概念，跟文学研究不沾边。他们之所以能够接受“身份理论”“后殖民主义”“创伤理论”“空间理论”这些原本也并不属于文学的理论，可能是因为这些理论是文化的、社会的、外在的和现实的。殊不知，文学活动是离不开认知的，文学作品的创作与阅读过程更是受认知的影响，如果对“认知”这一关键要素避而不谈，仅仅关注表层看得见的文本及其外部因素，我们对文学活动及文学作品的认识始终只能是雾里看花。

三、对“认知转向”过度焦虑的根源

诚然，由于认知文学研究如今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尚有许多不足和待完善之处，诸如目前国内常见的套用认知理论但是无法对作品解读出新意、理论味浓厚、与作品结合不紧密等问题。但是这种问题只是暂时的，毕竟国内的认知文学研究才刚刚起步，国外目前也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假以时日，这种状况一定会有所改观。我们认为，当前一些人对认知文学研究的质疑和批判实际上是对新生事物及其未来发展的担忧和焦虑，而这种担忧和焦虑其实是没必要的过度焦虑。

就认识论而言，首先，一些文学研究者不了解“认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生态批评”“心理分析”等不同，“认知”概念本身太“模糊、宽泛、不确定”^{[9]2}，将其作为“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的前缀，学者们不清楚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与传统文学理论如心理分析、读者反应论有什么区别？就连该领域的领军人物也无法对自己所从事的领域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例如艾伦·理查德森（Alan Richardson）认为“认知文学研究”最精确的定义应该是“痴迷于认知科学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们的研究，他们之间有许多东西可以交流，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意见分歧”^{[9][12]}。这一定义也得到了丽莎·詹塞恩（Lisa Zunshine）的认可：“认知文学研究的最佳定义是理查德森于2004年提出的。”^[13]然而很明显，这一定义仍然没有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认知文学研究，这势必引起“道路恐慌”。由于理论流派繁多，又没有权威的界定，部分学者也没有深入了解，导致对该领域存在误解。比如，一些人仍然将认知诗学狭隘地理解为是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来研究诗歌；许多人将认知文学研究等同于文学实证研究，或者误以为认知文学研究就是将认知神经科学的理论和实验方法引入文学研究，文学作品充当语料，目的是验证认知科学的理论假设，于是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家沦为了认知科学和认知科学家的附庸和助手。其次，一些学者对文学研究存在狭义理解，没有区分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比如，将文学研究等同于文本分析，从而认为认知文学研究中涉及的对“移情”和“读者认知加工机制”等的研究不属于文学研究。

就方法论而言，焦虑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在研究方法、理论范式上存在很大差异，人文学科重逻辑推理，而自然科学重实验数据，这种研究理路的不同造成了两个研究群体的相互隔离。“让熟悉人文学科研究范式、方法的文学研究者去接受并运用认知科学的理论范式、方法是一件不容易的事。”^{[8]16}一方面，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理论经历了多重学科、多种主义的洗礼，例如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利伐·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后马克思主义、后黑格尔现象学和相关的文化潮流等，文学理论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我们对当下现实的重要关切，如后殖民时代的政治、种族、性别等问题。虽然如今情况发生了改变，但人类潜在的思想传统还依然保留着^{[8]15}。文学研究者对传统的文学理论和范式有一种不

舍之情,不愿意否定或放弃自己熟悉的传统文学理论和范式,免不了对新的认知研究范式存有抵触情绪。另一方面,认知文学研究的理论来源庞杂、范式方法多样。认知科学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多学科,除了认知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神经科学和心智哲学等主干学科外,还包括人类学、认知语言学等外围学科,而且其疆界还处于不断拓展之中^[14]。认知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来自于一个不断发展的、无固定疆界的其他领域,致使原本就对认知科学理论不熟悉的文学研究者更加无所适从,陷入了“理论、方法恐慌”。

四、认知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性”问题

《今日诗学》(Poetics Today)在2002年和2003年的专刊里对文学与认知跨学科研究的有效性进行了讨论,其中强调“与认知文学批评最生死攸关的问题是关于文学语言和形式的文学性问题”^[15]^[13]。如今关于认知文学研究的批评和质疑,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文学性”问题。但是我们此处所谓的“文学性”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文学文本的“文学性”,即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区别性特征是什么;第二层是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即什么是文学研究,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是什么,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文学性”这一概念,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俄国形式主义学派提出“文学理论是一门科学”的口号,把文学研究关注点转向了文本本身,聚焦于文学作品的语言。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指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说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16]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将“文学性”视为文学语言的特性,文学研究就是研究文学语言区别于日常语言的形式特征,比如节拍、重复、排比、韵脚等。后来,形式主义者将文学性发展为作品语言及故事结构的陌生化和创新性。

学者们对形式主义学派的定义并不满意。尤其是20世纪末开始出现了文学批评的文化研究热潮,文学研究从文本内部研究变成了对社会、历史、伦理、种族、性别、阶级、生态等外部因素的研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文学性”概念受到冲击,原本所谓的“非文学的东西”如今变成了“文学的东西”,于是有人提出重构“文学性”概念,要求取消文学的自足性,消解文学与政治、哲学、历史、宗教等学科的藩篱,从而在一个大文化的氛围中来把握文学^[17]。于是先后出现了各种关于文学性的定义,比如功用主义文学性、结构主义文学性、本体论文学性等。归结起来,大致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派别:一派被视为本质主义,坚守纯文学的“文学性”概念;另一派被视为非本质主义,认为所谓的本质仅仅是一种幻觉,文学研究不应该局限于文学文本内部。长期以来,说者纷纷,对文学性并没有统一的认识。

学者们对认知文学研究的“文学性”的质疑源于多个方面。首先,认知文学研究关注的焦点不是单纯的语言和文本结构,也不是文本之外的文化环境,而是“文本”“读者”“作者”和“世界”四要素的“认知”互动关系,所以认知文学研究的“文学性”既不属于“本质主义”也不属于“非本质主义”,但是又与二者具有相关性。例如,认知诗学的鼻祖特拉维夫大学教授鲁文·楚尔(Reuven Tsur)2017年的新作《作为认知化石的诗歌传统》(Poetic Conventions as Cognitive Fossils)中对诗学传统和诗歌形式



的认知研究体现了认知文学研究对形式主义“文学性”的探讨。同时,丽莎·詹塞恩(Lisa Zunshine)的“认知文化研究”(Cognitive Cultural Studies)也没有忽略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

其次,认知文学研究不仅研究传统文学文本,还研究传统文学之外的文本,比如电影、戏剧、表演、绘本、漫画、音乐等。事实上,认知文学研究是一种以传统文学文本为主体的“大文学”研究或艺术研究。文学本身并不是天然的独立领域,在19世纪末以前,文学研究还不曾成为独立的社会活动。电影、绘本、音乐等都是与文学同源的认知产品,认知文学研究将其他认知产品也纳入研究范围,目的是想通过对同源产品的研究揭示大脑的普遍认知机制,而这种普遍机制的揭示反过来也会提升我们对文学活动的认识,帮助我们解释许多文学现象。

再次,认知文学研究所采用的理论、术语和方法与传统文学研究有很大不同,这种研究范式的差异给认知文学研究打上了异类的标记,认知文学研究是否属于文学研究造成了部分学者心中的困惑。我们认为,认知文学研究当然是文学研究,正如认知语言学研究仍然是语言学研究一样。认知文学研究立足于文本,但又不局限于文本,而是将人类的心智及其物质基础也纳入考量的范围。“从这种意义上说,跨学科的认知文学研究(或认知文学科学)属于认知科学,但是这并不否认它是文学研究的一种。”^{[18]296}

认知文学研究对于揭示文学的本质具有重要作用。它不仅不会模糊文学性,反而还能够发掘出传统文学研究所不能发现的文学性。例如,美国认知文学研究领军人物丽莎·詹塞恩(Lisa Zunshine)对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套叠心智状态”(Nested Mental States)^{[13]176-178}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我们日常交际中只有偶尔会涉及三层心智状态套叠,但是在小说、戏剧、叙事诗以及回忆录等只要是涉及想象和意识的文学作品中,都至少存在三层以上的心智状态套叠。这充分说明,从认知的角度揭示文学性也是一种可行的路径。

即使认知文学研究在理论方法、侧重点、研究范围等方面偏离或超越了传统文学研究,但是它始终在另一条路上深化文学研究的内涵、促进文学研究的发展、揭示文学的本质,所以认知文学研究事实上并没有弱化“文学性”,反而填补了“文学性”在认知维度上的空白。文学研究的传统范式事实上是一种二分法,即强调文学特殊性,注重对具体的个体文本的解读,但忽略了对文学整体的普遍性规律的研究,无法揭示文学的本质及其与人类认知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认知文学研究能够作出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认知转向”:文学研究的新机遇

文学研究在20世纪先后经历了“语言转向”和“文化转向”,进入“后理论”时代以后,文学研究陷入了迷茫期,传统的文学理论被解构,文学研究应该何去何从,成为文学研究者思考的问题。如今正在开始的“认知转向”^①就是文学研究冲出困境、谋求发展的新机遇。

万事万物的兴衰无不受时代潮流的影响,文学研究亦是如此。21世纪被称为“认知科学的时

^①由《当代外国文学》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承办的“物质、生态、科技:后人文主义与当代外国文学——2019年当代外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3月22—24日在广州举行,此次会议设置四个专题论坛,第二个专题论坛就是“当代外国文学的认知转向”。

代”,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人文科学被边缘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①[19]}。国外许多人文教授开始忧虑他们所从事的学科的未来,因为选择人文学科的学生越来越少,政府财政经费不断缩减,人文学科毕业生就业难,人文学科甚至被一些人嘲笑为无用的学科^[20]。文学作为人文学科中的典型代表,更是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文学研究几乎变成了一群人内部自娱自乐的游戏,而外界则只看到了文学附带的简单功能,如写作技能、休闲娱乐等^[19]。与那些计算机科学、医疗科学、航天科学等硬科学相比,文学的这些功能似乎不值一提,也难怪如今到处都呈现出“重理轻文”的迹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文学教授需要证明文学研究的更大的用处”^[19],而“认知”就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方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外文学界出现了文学的“认知革命”或“认知转向”,而且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这股力量越来越强,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广。

“认知革命”已经被一些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呼吁了长达 27 年了。早在 1991 年,马克·特纳(Mark Turner)就说到:“要重塑英语研究,将英语研究与揭示心智的奥秘结合起来,使英语研究者成为心智揭秘行动的参与者甚至领导者。”^[21]2003 年,帕特里克·霍根(Patrick Hogan)称道:“认知方法、认知话题、认知原则可以说已经主导了今天几乎绝大多数令人激动的学术领域。”^[22]他的著作《认知科学、文学与艺术:人文学者指南》(Cognitive science,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A Guide for Humanists, 2003)作为一本启蒙读本,就是要鼓励广大人文学者参与到与科学的对话当中。如今这一切将成为现实,“对于对文学与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感兴趣的文学研究者来说,现在是一个伟大的时代”^[23]。2010 年《纽约时报》也发文称詹塞恩领导的认知文学研究是“英语中的下一个大事件(Next Big Thing in English)”^[24]。

文学研究的“认知转向”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除了外部的压力,还因为这种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强大的生命力。认知文学研究主要有两个大的方面的意义:一是运用认知科学的理论可以深化文学研究,拓展文学研究的范围,提升文学研究的科学性,丰富文学研究的范式、方法。二是认知文学研究将对认知科学作出贡献,文学蕴藏着认知科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亦如特伦斯·凯夫(Terence Cave)所说,文学既是人类思维的工具也是人类思维的载体^{[8]14-15}。与研究语言本身相比,文学研究最有利于揭示人类认知的运作过程。哲学家和实验心理学家独自介入纷繁复杂的文学研究领域可能手足无措,但是如果原本就很熟悉这一领域的文学研究者的帮助,他们定会从文学研究中找到揭示人脑运作过程的重要证据。

帕特里克·霍根(Patrick Hogan)承认,文学批评家要想在广泛的科学技术领域中成为主导者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但是人文学者和科学家都必须认识到,艺术不是无足轻重的边缘领域,也不是认知科学成果的输出地,人文学者必须至少是认知革命的领导者之一^{[22]2}。他将人文科学与认知科学之间的对话看作是一种协作与交换的关系,他警告我们,如果文学批评家对这种趋势视而不见、不积极作为,那么我们终将失去参与和主导这场对话的资格^{[22]2-3}。

参考文献

- [1] 熊沐清.文学批评的认知转向——认知文学研究系列之一[J].外国语文,2015(6):1-9.
- [2] David Richter. A Companion to Literary Theory[M]. Hoboken:Wiley Blackwell, 2018: 408-421.

①国内最近掀起的关于“英语专业是不是对不起良心的专业”的大讨论正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无独有偶,这种情况在国外早已屡见不鲜。



- [3] Lars Bernaerts, Dirk De Geest, Luc Herman, Bart Vervaeck. Stories and Minds: Cognitive Approaches to Literary Narrative[M].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3: 14-15.
- [4] Marie-Laure Ryan. Narrat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A Problematic Relation[J]. Style, 2010 Vol. 44 Issue 4: 469-495.
- [5] Monika Fludernik. Naturalizing the Unnatural: A View from Blending Theory[J]. 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 2010 Vol. 39 Issue 1: 1-27.
- [6] Hans Adler, Sabine Gross. Adjusting the Frame: Comments on Cognitivism and Literature[J]. Poetics Today, 2002 Vol. 23 Issue 2: 195-220.
- [7] Raymond Tallis. The Neuroscience Delusion[N].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2008-04-09.
- [8] Terence Cave. Thinking with Literature: Towards a Cognitive Criticism[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 [9] Alan Richardson.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Cognition: A Field Map[M] // Alan Richardson, Ellen Spolsky. The Work of Fiction: Cognition, Culture, and Complexity. Ashgate,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2004: 1-25.
- [10] 汪介之.“理论入侵”与外国文学研究创新之惑[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8-07-12(006).
- [11] 蒋承勇.“理论热”后理论的呼唤——现当代西方文论中国接受之再反思[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1): 134-145.
- [12] Alan Richardson. Literary Studies and Cognitive Science[M] // Steven Meyer.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and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207.
- [13] Lisa Zunshin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14] Pilar Martinez Benedi. The “Cognitive Turn”: A Short Guide for Nervous Drivers[J]. Status Questions, 2014 Vol. 47 Issue 2: 127-155.
- [15] Freiman Marcelle. A “Cognitive Turn” in Creative Writing: Cognition, Body and Imagination[J]. New Writing, 2015 Vol. 12 Issue 2: 127-142.
- [16] 茨维坦·托多洛夫. 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G]. 蔡鸿滨,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24.
- [17] 马汉广.“文学性”概念的多重蕴涵与当下意义[J]. 文艺研究, 2014(7): 31-40.
- [18] Jana Kuzmíková. Cognitive Literary Research as a Showcase of Multidisciplinary Concept of Science[J]. Problems of Literary Genres, 2014 Vol. 57 Issue 1: 295-308.
- [19] Diana E. Sheets. The Crisis in the Humanities: Why Today’s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perts Can’t and Won’t Resolve the Failings of the Liberal Arts[EB/OL]. [2018-08-08] (2013-09-14).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dr-diana-e-sheets/the-crisis-in-the-humanit_b_3588171.html.
- [20] Michael Fischer. Literature and Empathy[J].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2017 Vol. 41 Issue 2: 431-464.
- [21] Mark Turner. Reading Minds: The Study of English in the Age of Cognitive Scienc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vii.
- [22] Patrick Hogan. Cognitive Science,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A Guide for Humanists [M]. London:

- Routledge, 2003.
- [23] Christina Bieber Lake. Communion, Not Consilience: Protecting the Future of Inter- 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y[J].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2017Vol. 41 Issue 2:290–303.
- [24] Cohen Patricia. Next Big Thing in English: Knowing They Know That You Know [EB/OL]. [2018-08-08](2010-04-02).<https://www.nytimes.com/2010/04/01/books/01lit.html>.

"Cognitive Turn": the New Chance of the Literary Studies

Feng Jun

(Graduate School,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Abstract: Recently,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has brought about anxieties and skepticism among scholar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Some scholars abroad scold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for its blindness to tradition, the potential backfire of eclecticism, a new essentialism and a reductionist teleological thinking; while some domestic scholars also adopt a skeptical attitude to the "Cognitive Turn". Their anxieties and skepticism can be attributed to two aspects: for one thing, due to the gaps or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s, some people know little about Cognitive Science and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thus have a prejudice against this area; for another,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exhibits some temporary flaws in the early stage of its development, which leads to some scholars' skepticism.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ir skepticism towards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is in fact excessive anxieties on newborn things.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drawing insights and methods from Cognitive Science aims to answer literary questions and solve literary problems. It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from "cognition" and promotes traditional literary studies. The "cognitive turn" in literary studies provides a new road for literary studies out of the "post-theory" dilemma, rather than makes literature "literarinessless".

Key Words: cognitive poetics;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cognitive turn; literariness

(责任编辑: 张晓月)